

衔接与赓续

XIANJIE
YU
GENGXU

19世纪

西方文化史研究

19 SHIJI XIFANG WENHUASHI YANJIU

傅 琼 ● 著



YZLI0890121938



上海三联书店

衔接与赓续

19世纪西方文化史研究

傅 琮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衔接与赓续:19 世纪西方文化史研究/傅琰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11

ISBN 978 - 7 - 5426 - 3656 - 0

I. ①衔… II. ①傅… III. ①西方文化—文化史—19 世纪
IV. ①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5051 号

衔接与赓续:19 世纪西方文化史研究

著 者 / 傅 琰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邮购电话 / 24175963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3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656 - 0/C · 397

定 价 / 32.00 元

文化史传统的衔接与赓续

——序傅琮著《19 世纪西方文化史研究》

读书是一种愉悦，倘是“重读”，往往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甚至有新的发现，此刻也许会萌生出一种如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惊讶的快乐”。^① 不是吗？眼前就有一个显例，那就是重读傅琮博士的大作《19 世纪西方文化史研究》。

三年前，是农夫播种耕耘的时节，读过傅琮《19 世纪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打印本。不料事隔三年后，又是一个春天，一个春意正浓的日子，我重读之，就有不少的“新发现”，比如这一行文字就立即映入了我的眼帘：

就 19 世纪文化史和文化史传统与新文化史的关系而言，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犹如一座桥梁，连通了西方文化史发展的长河。

“一座桥梁”，立刻让我联想到那横跨浦江两岸的一座座大桥，把浦东与浦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傅琮借用这一形象的比喻，生动地勾画出了 19 世纪西方文化史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在桥的一头是前 19 世纪文化史，在桥的另一头是 20 世纪文

^① 见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附录：《论趣味》，第 148 页。

化史和新文化史,正是有了 19 世纪文化史这一座“桥”,将这两头联了起来,才使西方文化史研究传统得以衔接与赓续。

是的,西方文化史确实是一条长河,其源头始自希罗多德,他的传世之作《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名著,也是西方文化史上的首部经典,以其丰赡与广博流向后世。

在西方史学史上,影响后世西方史学的两个源头,皆生成于古希腊,那就是希罗多德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另一是修昔底德的政治军事史传统,然在其发展过程中,前者终是涓涓细流,后者却潺潺滔滔,一泻而下,绵延两千四百余年,至 19 世纪兰克,终成大河,蔚为壮观。

这是为什么?我正这样想着,傅琮的另一段文字又吸引了我:

然而,也正由于这种(指希罗多德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全景式的风格,广博、宽宏,导致了这种传统的“非聚焦性”特点。因而长期以来,文化史远不如以政治事件或精英活动为专题研究对象、具有强烈聚焦性特点的政治军事史那样,得到了自古以来的不绝如缕的赓续。

傅琮在第二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而又令人信服的分析。其实,她说的意思很明白,希罗多德作为西方文化史的源头,作为“西方文化史之父”,他那种视野与领域,他那种叙史艺术,那种睿智与才华,后人承继谈何容易。只有到了 18 世纪,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积蓄起来的文化史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开拓与创新的基础和业绩。这个开拓与创新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伏尔泰。

伏尔泰,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领袖,引领思想之潮流,又开一代新“史风”。对此现代英国史学史名家古奇赞道:“伏尔泰创

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为‘文化史’的类型。”^①古奇之言不虚，这从伏尔泰的名著《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等可以作证，也可以傅琮那样的学术研究成果作证。总之，他是无愧为“近代文化史之父”这个称号的。

在进入 19 世纪西方文化史正题之前，傅琮还说到德国的赫尔德。“赫尔德文化史观主要是建立在对伏尔泰理性主义思想的批判的基础之上，体现了启蒙运动晚期和浪漫主义早期对启蒙思想进行反思的基调。它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对 19 世纪文化史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吸取了论者之见，尔后又作了阐释与发挥。

在这样历史铺垫的基础上，本书拉开了 19 世纪西方文化史的大幕：从世纪初的弱小开始，但即使在兰克史学作为主流时，也还可以听到支流的水声潺潺，看到它的微波粼粼；它流至 19 世纪中叶，渐流渐涌，文化史写作者的日渐增多，为其推波助澜；至 19 世纪 70 年代，终于“百川分流注于海，群山蔓延朝于宗”，这一文化史研究的潮流，直到兰普莱希特谢世，才结束了它的 19 世纪流程。

19 世纪西方文化史研究，是由一批优秀的文化世家来承担的，他们的相继出现，犹如桥上的一个个标志性路标，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且看：

最先朝我们走来的是基佐，这位从政从学两栖型的“天才历史学家”^②，挟着他在 20 年代的文化史研究成果：《欧洲文明史》

① 乔治·皮博迪·古奇：《19 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8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47 页。

和《法国文明史》，去“追踪欧洲文明的进程”（傅书小标题，下同）；

继而是巴克尔，这位可以称得上是“史界之骄子”的卓越的历史学家，以其两卷本的《英国文明史》之精论，去“探讨文明进程的规律”（50年代前后），令人赞叹，而他于不惑之年病故，英年早逝，又令人唏嘘不已；

“最卓越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从史学的旧营垒中走出来，他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经典文化史作品，纵谈人文主义之理念，“追问人性的本相”，为60年代旨在冲击传统史学的“文化史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后进入我们视野的文化史家是兰普莱希特，他于跨世纪之际，阐发文化史的方法论，以一种大别于19世纪传统史学的历史眼光，志在创建一个“新型的文化史学派”，终于与20世纪初期的文化形态史观学派相衔接。须知，兰普莱希特谢世时的，1915年，也正是他的德国同胞、文化形态史观始作俑者斯宾格勒的名作《西方的没落》完成之际。

就这样，傅琰的书带领我们，浏览西方文化史之源头，观看19世纪文化史之流向，了解19世纪西方文化史之气质，更引领我们解读与领略19世纪代表性的文化史家之风采。作者描述这一百多年的文化史，增长知识，启人心智，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傅琰的《19世纪西方文化史研究》，我以为，关于背景的梳理，清晰而又条理；关于气质的阐释，精确而又全面；关于人物的叙述，鲜明而又翔实；关于评价的论说，审慎而又到位。简言之，这是一本当下研究19世纪西方文化史的佳作，为我国的世界文化史尤其是西方文化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颇具开拓性的意义。

在这里,我需要为读者指出的一点是,傅琰的这本大作之旨趣。作者用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注,作了交代。注云:本书所指的是“19世纪西方文化史”,并不是19世纪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历史,而是指19世纪的西方文化史家们所研究西方历史文化各个阶段发展情况的历史。对于这个注,我需要补白几句。首先要说的是文化。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对文化作出自己的描述,人类投影于文化中,从而认识自己,倘问什么是文化呢?我真的没法在这篇小文中说清楚,事实上,关于“文化”这一概念的界说,一直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见。^①1952年,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加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合撰《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列举了从1871至1951年这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竟有161种之多。从那时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恐怕也一直在“与时俱进”吧。

再说文化史,因为“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就决定了“文化史”术语的莫衷一是。就现当代中国学者比较普遍的意见,一是广义的,说文化史的研究涵盖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另一是狭义的,说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其重点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以区别于一般的通史。

这种概念的纷争与繁琐的考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视为“短钉之学”,意义不是很大。但本书作者对此是有学术界定的,因为这关系到她的学术理路与写作规范。这就启示我们,在争论不休的学术概念面前,你最好选择一种,姑且称之为“工作定义”,据此写你的文章好了。

我还要说的是,傅琰的大作,是对19世纪文化史家笔下学术成果的研究,是一种研究的研究,比如基佐对文明史(文化史)

^① 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

的研究,作者对它要进行再研究,批判反思,作出总结。这显然是一项史学史的工作。因而,19世纪西方文化史的研究,具有深层次的学科反思的性质,其工作难度要远胜于单纯地揭示19世纪西方文化发展的本身,不管它指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总和,还是说作为观念形态意义上的文化。

最后,借助这篇小文,我要说一说本书作者傅琮了。作为一名“复旦学子”,傅琮在我这里三年攻读博士学位,概括地说来,可谓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这个在职的又常在沪赣道上奔波的妈妈学生来说,要完成学业,其艰难其困苦,可想而知,不说也罢。但她读书时的形象,至今仍在我脑海中留存,记忆犹新,现略叙一二。

比如,开题前。她在选题上费尽心力,曾与我作了多次切磋,最终定格在19世纪西方文化史,因为它是“一座桥梁”,富有挑战性和吸引力。在正式开题前,据我多年来积下的习惯,终要先进行“预开题”,她的开题报告其实写得不错,我看可以了,但她说说着说着,竟动情地说:“张老师,我没有写好,某某比我写得好,我还要重写。”有的学生不把开题当回事,她不是这样,她追求完美。后来她果然重写且又上了一层楼。正式开题时,获得了老师们的好评。

又如,读书期间。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论文期间,按学校规定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文章,这对大多数同学来说,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不付出艰辛的劳动,是难以完成的。根据我的经验,学生只要“处女作”写好了,接下的路就顺畅得多了,平心而论,对此我是很专心,帮助他们改了又改,直至成功。而她却胸有成竹,每每问及,给我的反馈总是“报喜”,说这篇文章发表了,那篇文章又被录用了,还在写什么文章,这一方面说明她有很强的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但在这背后,她付出的努力与

艰辛,当是可想而知的了。在校期间,她发表的文章已有五篇,这可算是对她追求完美的回报。

然而,追求完美有时也仅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主观愿望,正像我们的历史研究,距历史本相这条线,只能永远是一条渐近线而不可能达到它。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对完美的追求。还是回到傅琮这本书,追求完美的她,其书中必然也有不少缺陷,留下不完美之处。我要说的一点是,对于这部书的原型,在她写作时,就其不足,我已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后来她也作了修改。至于其他,我就不在这里饶舌了,还是留给读者们去评说吧。

学术传统,需要衔接,更需要赓续。傅琮的书既然是一种研究的研究,这对 19 世纪西方文化史是如此,对本书作者也是如此。进言之,就后者而论,像傅琮这样辈分的人,只要虚心好学,永不满足,当可望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在衔接与赓续的接力赛跑的征程中,充当一个好选手,甚至是领跑者,除非他自己放弃,丢下了接力棒。总之,薪尽火传,学术的发展就可能一代传一代,永远不会有尽头。傅琮,你说呢?

是为序。

张广智

2011 年春日于复旦书馨公寓

目 录

文化史传统的衔接与赓续

——序傅琮著《十九世纪西方文化史研究》 1

导论 1

上篇 文化史的历程和特质

第一章 时代与社会:19 世纪文化史的条件 37

一、复杂流变的社会 38

二、风起云涌的思潮 49

三、繁茂兴盛的学术 62

第二章 渊源与参照:19 世纪以前的文化史传统 74

一、希罗多德与文化史的源头 75

二、伏尔泰与近代文化史的产生 88

三、赫尔德与近代文化史的演进 104

第三章 兴起与发展:19 世纪西方文化史的基本历程 119

一、较为弱小的早期阶段 119

二、日渐成长的中期阶段 130

三、羽翼渐丰的后期阶段 140

第四章 对象与方法:19 世纪文化史的基本气质 151

一、以文化为研究对象 152

二、以现实关照为研究基点 167

三、以跨学科为研究趋向 179

下篇 文化史家及其史学思想

第五章 基佐:追踪欧洲文明的进程 195

一、思想与理论来源 196

二、欧洲文明进步史观 208

三、自由、法律与文明 222

第六章 巴克尔:探寻文明进步规律 238

一、思想与理论来源 239

二、文化史与文明进步规律 249

三、宗教与文明 268

第七章 布克哈特:追问人性的本相 286

一、思想与理论来源 287

二、连续与均衡史观 298

三、文化史与人的发现 311

第八章 兰普莱希特:寻求史学新动向 326

一、思想与理论来源 327

二、集体心理变更与社会进步 339

三、文化史与新旧史学之争 348

结语 369

参考文献 379

 外文文献 379

 著作 379

 论文 384

 中文文献 388

 著作 388

 论文 396

后记 399

导 论

“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①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

一、选题意义

19 世纪西方文化史^②上承自希罗多德(Herodotus, 约公元前 484—前 425 年)以来的西方文化史传统^③,下接新史学和新文化史等当代西方史学范式,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中应有一席之地。然而一直以来,学者们对它的关注不多,将它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更为鲜见。因而,以 19 世纪文化史为研究对象,梳理它

①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 18 页。

② 本书所指的“19 世纪西方文化史”,并不是 19 世纪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历史,而是 19 世纪的西方文化史学。由于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如汤普森、巴恩斯、布鲁塞赫、贡布里奇和彼得·伯克等),往往将西方古典文化史学和当代文化史学表述为 Cultural History 而不是 Cultural historiography,加之周兵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当代西方文化史学,而采用了“当代西方文化史研究”之题,是故笔者沿袭此法,将“19 世纪西方文化史学”称为“19 世纪西方文化史”。此为本书标题之释。

③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8 页。文中,作者指出,“西方史学的发展史,大体说来,从古代开始,就形成了三种传统,即以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的社会文化史传统、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奠定的政治军事史传统以及由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所确立的神学传统。”这一分类法得到了众多史家的认同,笔者在此本书中采用了这一分类法。

的基本情况,分析它的基本气质,阐释出它在西方史学宝库中应有的地位,在笔者看来,是极其必要的。因为:

其一,19世纪西方文化史既是西方文化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西方史学史长链不可或缺的一环。

西方文化史传统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开创。自开创之时起,它就以整体视域、宽宏丰赡、广采博收的特点而闻名于世。然而,也正由于这种(指希罗多德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全景式的风格,广博、宽宏,导致了这种传统的“非聚焦性”特点。因而长期以来,文化史远不如以政治事件或精英活动为专题研究对象、具有强烈聚焦性特点的政治军事史那样,得到了自古以来的不绝如缕的赓续。

但文化史始终是西方史学史长链不可或缺的一环。一方面,政治事件和精英活动只是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一个小部分,它不可能涵盖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展现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性。只有以精神生活为内核、具有整体特征的文化史,才更易于研究者发挥各人的独创性,撰写出能够多维度地展现人类社会历史生活风貌、重构出人类社会历史五彩斑斓真景象的独具匠心之作;另一方面,任何历史事件,不管多么伟大或多么引人注目,如果与整个文化的兴衰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任何物质生活,不管多么繁盛或奢华,如果脱离了精神生活,都是难以道明或理解的。所以,历史学家所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事件或活动本身,而且还须解答史实背后的人文动机和人文精神。这就要求历史研究决不能停留在物质史的层面,还需深入到文化史的深处。没有精神生活,便没有人类的文化史,而只有人类的生物史。也就是说,既然人类有精神活动,就必然有文化史或人文生活史。

因而,文化史传统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被废弃,它潜存于部分历史学家的历史作品中。至少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它再次公

开萌动^①。而在理性主义盛行的 18 世纪,它以新史学的风貌出现,公开关注人类历史的精神生活层面,这样一来,文化史研究更成为一股洪流,遍布于欧洲诸国,使西方史学面貌焕然一新。

19 世纪时,西方文化史又具有了一些新的气质,以新的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化史长河和西方史学宝库中。虽然在世纪初,出于对理性主义的反动或修正,人们往往将具有广博特征的文化史视为理性主义表现形式之一并置其于边缘地带。加之当时历史职业化梦想和政府政治导向力量的双重影响,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将研究限定于政治史,文化史研究被冷淡,致使 19 世纪文化史在整个上半叶时失去了启蒙时期那样位居优势地位。不过,文化史并未完全沉沦,它被保存下来并逐渐发展起来了,体现出一些新形象。为什么 19 世纪西方文化史得以发展起来呢?原因主要在于 19 世纪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随之不断发生改变。文化观念状态与现实变革之间逐渐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反思文化观念成了当时欧洲社会的主要文化现实。尤其是当变革深入到各种具体层面而遭遇强大阻力时,理论学术界便将目光转向了传统文化,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考察,找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将它们有效地连接起来,进而培养或转换民族文化心理,推进实质性的社会变革。这种情况在像德国那样还没有实现政治统一的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②。它们希望借助文化

① 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185 - 191. 也可参见【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05 页。

② 由于 19 世纪德国的政治史走在西方各国的前列,学界通常认为,德国的文化史发展应该是西方各国中最弱的。而事实上,在德国统一过程中,从横向上看,与政治史相比,文化史当然比较弱小;但从纵向上看,它自身一直处于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对德意志民族文化认同起到了较大作用。

传播民族情感,往往从以往历史中寻找民族文化认同感,文化传统对于历史与现实的重要作用被不少学者强调和重视。其中有些历史学家基于对现实社会的关照之情,勇敢地进入了传统政治史学很少涉猎的研究新领域,试图将历史范围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便更好地展示人类精神生活的实质。这正如古奇所总结的:“尽管不可否认,各民族和帝国的成长、政治家的伟大功绩、各政党的兴衰仍然是最受历史学家注意的问题,但自然界的影 响,经济因素的压力,思想和理想的起源和转化、科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文学和法律的贡献、物质生活条件等等,也同样进入了历史学家的眼界。”^①

当然,19世纪西方文化史仍然只是当时“历史学科中的灰姑娘”^②。虽然从纵向上看有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但文化史家之间鲜有联合。除德国史家兰普莱希特之外,很少有文化史家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文化史学派。加之当时从事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不少是二流史家或业余史家,他们的努力虽对社会读者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对学院史学圈子产生的冲击有限;一些文化史家虽是学院史学界中一流的历史学家,可由于他们人单势孤,很难真正站稳脚跟,也未能使文化史成为当时史学研究中的显学。但文化史毕竟是19世纪西方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个人认为,19世纪西方文化史的展开,犹如“百川分流注于海,群山蔓延朝于宗”,不同文化史家的实践,从不同角度展示了19世纪文化史的发展态势,既达致了西方文化史传统中所未曾有过的广度和深度;也开拓了西方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了西方史学史这一史学宝库。

①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59页。

②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 1.